

2005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柯 惕

200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60 周年, 故抗日战争研究重新出现高潮。国内举行的会议主要有: 6 月 20 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大学联合举办的“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学术研讨会; 8 月 3- 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武汉政协和江汉大学联合举办的“救亡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8 月 7 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抗战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 8 月 7 日- 11 日由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 8 月 15- 16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9 月 1- 4 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10 月 13- 15 日由复旦大学与韩国近现代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韩国光复 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2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亚洲人民抗战胜利 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2 月 26- 28 日由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超过百种, 各史学类学术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仅以笔者所见著述, 述评如下。

一 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

(一) 日本侵华研究

日本侵华研究仍为热点,2005 年出版的数种与日本侵华史相关的著述中,既有研究日本侵华罪行的,也有研究日本侵华政策的。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如下研究比较引人注目。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引人关注的是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7-12 月出版),该史料共分 28 卷,汇集了各卷编者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台湾以及国内各档案馆收藏的相关史料,其中有很大部分为首次刊布。该史料集还收录了历史图片和档案史料照片 880 余幅,其中近 1/6 图片是最新发现、首次发布或经重新考订的。另外,还设专卷集录了近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口碑史料,其中既包括中国受害者的回忆,也包括日军官兵加害者的回忆。故该书对把南京大屠杀研究推向深入,无疑有重要作用。如参加该史料编纂的孙宅巍利用新史料而著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 7 月出版),该研究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大屠杀的时空界定、性暴力发生的位置与特点、新发现的埋尸地点以及民众对日军暴力的抵抗,都比以往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细菌战研究,吴永明著《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化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 4 月出版),通过对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揭露了日军在江西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该书的价值在于,作者利用了大量口述史料,比以往研究更具体地描述了日军细菌战的实况。另外,该书还对近年来关于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进行了法律方面的分析,对

人们认识战争遗留问题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

关于战时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研究,何天义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7月出版),是迄今最为完整的被掳日本原中国劳工的口述史料。该书共5卷,刊布了500多名幸存劳工的口碑,真实记述了日本侵华时期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九州岛煤矿、本州金属矿业、日本各地土木建筑、港湾装卸与造船等共计55家公司135个作业场近4万名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该资料集的出版,对于被掳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有较高参考价值。

关于“慰安妇”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失,进展不多。惟田苏苏的《日军慰安妇在华北地区的实施》(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因为利用了台湾省编印的《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以及中央档案馆尚未对外开放的日军战俘口供,并结合实地调查,对日军在华北地区慰安所的分布、华北慰安所的形态与特点、日军强掳慰安妇的手段,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该研究不仅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也有助于人们比较具体地了解战时慰安妇制度的性质,即它的实施是日本政府与军方操纵,并非商业行为。

关于日本战时的毒化政策,李淑娟的《日伪的鸦片毒化政策对东北农村的影响》,利用了较多的满铁资料和其他档案资料,对日本在东北实施毒化政策的演变过程、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东北农业的危害以及烟毒对东北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在地域研究的范围内,具体地把日本毒化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她的专著《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当代中国出版社8月出版),则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同样具有较大的研究参考价值。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

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 6 月出版),是作者继日本侵华时期“笔部队”研究之后的又一部新著,该研究的进展在于,以新发掘的史料为基础,更详实地记述了战时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为配合日军侵华在思想宣传、学术情报、奴化教育、新闻舆论、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实施的“文化战”,揭示了日本文化侵略的政策策略、实施途经及对中国的危害。作者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并非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和文化人。这种观点并非准确,却是一家之言,可以给人启发。而与日本的文化侵略相关,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月出版),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公私文物损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和战后中国对日本掠夺文物的追索等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战时中国古典书籍、古建筑、文物的损毁破坏,以及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战后中国的追索,进行了比较详实的论述,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研究,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月出版)引人注目。与以往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研究不同,该研究更侧重日本侵华政策根源及演变分析,把日本的侵华政策上溯到甲午战争前,即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的制订时期。该研究论述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大陆政策内容的不断演变及其推行,认为,日本的一切对外侵略,包括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局部侵略、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都是大陆政策实施的结果。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可使人比较系统和完整地了解日本自近代以来直到战败期间的侵华政策演变过程。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步平、王希亮的《日本右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月出版),则从右翼对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论述了日本右翼最早

在19世纪产生的历史背景,系统地介绍了右翼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及其特点,右翼组织在战前、战时以至战后的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对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影响。作者认为,右翼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在政治上,右翼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得以建立的基础。而日本对外战争的发动,不仅与右翼的思想影响相关,并且,对中国侵略的一些重大事件,军队右翼都直接参预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研究还涉及了战后日本右翼状况,对战后右翼得以生存并继续影响日本社会的原因,战后右翼的组织特征和活动情况,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二) 中国抗日研究

由于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又一次出现一个高潮。研究内容,涉及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以下仅从笔都所见著述,择其精要评介。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开始引起学者关注。史学范式,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开辟视角从而推动实证研究深入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学者把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并不深入。而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05年第1期),首次提出了把抗日战争研究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去解读具有研究范式转变的意义。文章认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经济上,它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经济的存量,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政治层面上看,战争的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争取民主的成本和代价。该研究比较侧重日本侵华而造成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而同样是关于现代化研究范式,荣维木的《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

战争》(载《史学月刊》2005 年第 4 期),一方面赞同袁文观点,即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却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他认为,虽然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但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首先是政治制度方面,抗日战争无疑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并且,由于抗日战争使得中国进步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从此很难占到上风了。其次是社会改造方面,在抗日战争出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是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进程万进的一个显著标志。再次是经济方面,虽然战时的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带有明显的被迫性,但从客观上看,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工业内迁与布局的调整,都包含了现代化的因素。另外,战时的废约运动,也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民族国家。除以上研究,也有人以现代化视角对战时历史进行实证研究,其中,虞和平的《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 年第 4 期),正是从这个视角,对战时中国文艺的发展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解读,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以新文化运动为主流的文艺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中断。这主要表现在战时新文艺的现代性进一步强化和理性化。五四时期的新文艺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总体目标,以大众化为主要任务,以吸收和摹仿西方文艺形式为主要途径。而抗日战争时期,这些目标、任务和途径,不仅得到了强化和发展,而且更加理性化。如日益注意传统旧文艺与现代新文艺的关系、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等文化现代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成果,从而把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推

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方法,除上述现代化范式外,也有人从另外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张海鹏的《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文章要旨有三个: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能有全民族的抗战。第三,从民族战争政治条件来看,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些观点并非最新,但联系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理论争鸣,至今仍未取得结果,尤其是该文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不能不说还仍具有启发意义。无独有偶,郭德宏的《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也重新探讨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该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与领导者区分开来,认为领导权问题是中共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的策略思想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正确的主张和模范的行动影响和引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使其按照自己的主张行动,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这与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不是一回事。而如果是后者,那只能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关于这一点,他引据了毛泽东的《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的话,抗日战争与北伐战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除此两篇,相关的研究还有张宪文的《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

第 4 期), 不仅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如同上述观点的分析, 还特意分析了正面与敌后战场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也首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 明确肯定了战争期间正面战场的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党派的抗日战争, 而是全体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从这个视角研究历史, 无疑会对研究的深入与科学,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政治, 汪朝光的《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 年第 3 期), 以战争后期的军事状况及日本“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为背景, 分析了国共日三方的互动关系。其中涉及了国共两党以战后角力为主旨的政治策略的分析, 认为国民党着眼于以其合法政府的地位而争取盟国之承认与支持, 同时极力限制中共的扩展, 并不惜在一定程度上动用武力, 但缺少明晰的战略考虑与部署; 而共产党对战后与国民党的争夺却有明确的方针、切实的部署、有效的行动, 表现出远见之战略眼光与高超的战术技巧。这样的比较和这样的结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未曾有过。

关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 王桧林的《“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载《学术月刊》2005 年第 9 期), 通过在战时发表的 4 种反映战时蒋介石等真实思想的文章的分析,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认为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政策, 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 又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 表现出了复杂与变化。该文引人注意的是, 作者通过这种论述对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的简单化倾向提出置疑, 认为无论是否定蒋介石在抗中的积极方面和所作贡献, 还是否定他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 都是片面的。

关于战时日本的“和平”工作, 杨天石的《“桐工作”辨析》(载

《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主要利用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和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对发生在1940年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即“桐工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通过对史料的辨析,文章认为:这次谈判就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但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本秘密谈判之门。该文对于澄清以往关于“桐工作”研究中由于史料的差异而形成的叙史错讹,有很大价值。

关于汪伪政权的研究,张生的《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以一种新的视角,即政治生态的视角,对汪伪政权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出于政治需要,汪伪一直着意于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为此,它与重庆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并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但由于重庆在这方面的反制,日方本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特别是由于战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势反击,汪伪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目标无法达到。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弥补一项研究空白,也在于它把政治伦理学引入到了史学研究。

关于抗日军事研究,国民党军队是否进行过抗日游击战,以往已有研究,并且至今存在歧议。而郭代习的《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战术思想的成长》(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则是在肯定国民党进行过抗日游击战的前提下,对它的游击战战术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就曾有过游击战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演中转移至抗日战略战术。另外,蒋百里和李宗仁,也在全面抗战之前,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最初设想。而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则正式形成了抗日游

击战的战术思想,并且后来在实践中得到很大发展。该文观点为一家之言,恐仍有商榷空间。

(三)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日本文部科学省继 2001 年审订通过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之后,2005 年再次审订通过《新历史教科书》修订本。而该书继续篡改历史,宣扬右翼史观,引起了中国各界的极大关注。其中历史学者从理论上对该书进行了剖析,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如下两篇。

步平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 年第 2 期),比较系统地剖析了该书反映出的右翼历史观。作者认为:“《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确实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他认为:“《新历史教科书》最本质的问题,是通过精心选取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而根本转移或充分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危险的体系。”他进一步分析了该书建立唯心主义史观体系的过程:第一,在讲述日本远古史时突出日本文明的悠久而回避日本与亚洲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定论。第二,在上述基础上把“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描绘成是事实,以确立天皇制的所谓“万世一系”。第三,与古代史相联系,日本是神的后代,所以近代以后它在亚洲的领袖地位不容置疑。第四,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是武士对天皇的效忠,而推动日本近代社会变化的原因是武士的精神力量。第五,以上述日本优越理论为基础,论证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合理性。此

外,作者还分析了《新历史教科书》对战争责任的具体描述,以及该书反映的历史观与日本社会右倾化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特点在于,它对右翼史观的批判已经不仅是就事论事地对应右翼对历史的错误描述,而是从理论上对右翼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

同样围绕这个主题,王智新的《评2005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则具体地介绍了《日本政府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检定情况,并分析了检定的特点如下:第一,改变了反美或仇美的立场;第二突出强调天皇史观;第三,坚持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与韩国等亚洲受害国。另外,作者还披露了《新历史教科书》修订送检过程中的一些内幕情况,并认为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态度与2001年不同,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因此作者认为:“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政治的风向标。”

二 日本的研究

2005年日本出版的和近现代中日关系史有关的书籍和论文,数量多,质量也多为上乘,时间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期间,其他各方面也多有涉及。

(一) 抗战期间的中日关系。

小林英夫和林道生合著的《中日战争史论——汪精卫政权和中国占领地》一书由御茶水书房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汪精卫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反蒋、反共、降日的,对于日本军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汪精卫的“汉奸”定位,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该书还对汪精卫政权的统治进行了具体分析,把对汪精卫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明石书店出版的朱德兰的《台湾总督府和慰安妇》一书,探讨了抗战期间台湾慰安妇的状况。作者是台湾学者,曾求学于日本九州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该书对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花柳业、台湾总督府对花柳业的介入、台湾内外慰安所的形态和管理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原慰安妇也进行了访问取证,指出抗日战争期间的台湾慰安妇达几千人。由于台湾的情况特殊,正处于日本统治时期,作为台湾最高行政机构的台湾总督府,和台湾岛内以及华南特别是海南岛的日军慰安所有直接的关系,有台湾总督府背景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也介入了慰安所的设立。台湾慰安所的类型分日军直接经营、民间经营军部监督提供给军人以及和军队有关系者专用、由民间经营但军队以及和军队有关系者也可以使用三种类型。作者从台湾的角度,证实了日本政府辖下的台湾行政管理机构,曾介入慰安所的设立和管理。

由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中央大学出版部出版的《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研究》一书,探讨了国民党政权后期(1928—1949)的历史,是由土田哲夫主持的“国民党时期中国研究”的共同研究成果。该书有一部分文章涉及到中日关系,如服部龙二的《田中奏折和日中关系》,分析了田中奏折的出现和日本外务省及中国政府外交部对此的反应,认为该奏折出现在1929年上半年,由东北主导的可能性很大。田中奏折一直众说纷纭,难以定论,该文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讨。笠原十九司的《国民政府军的构造和作战》,分析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上海、南京作战,认为蒋介石的目的是消耗日军,但军队的构造以及指挥、作战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在这两个战役中,中国方面都付出了很大代价。

(二) 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有两本书者值得关注。其一是山根幸夫

的《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昭和前期的日中文化交流》，该书由汲古书院出版，集中探讨了昭和前期的日中文化交流事业。1923年，日中两国建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共同推进文化事业的交流，它成为战前日中文化交流的主要推进机构，不能说该机构一无所成，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的基本政策决定了它很难真正地推进中日文化交流。

其二是刘建云的《中国人的日语学习史》，该书由学术出版会出版。作者从日语学习的角度，对清末学习日语主要场所的东文学堂进行了考察，主要集中于清末中国人是如何学习日语的、这对清末的中日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作者指出，初期同文馆没有日语课程，不重视日语人才的培养。清政府1877年设立驻日使馆以后的十几年里，也一直认为日本是“同文之国”，没有必要培养翻译人才。但是在实际交涉中，因为语言的沟通不好而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才意识到了日语学习的重要性。但是，真正的国内日语教育，仍然是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伴随着学习和留学日本，建立了很多的“东文学堂”，有中国人设立的，也有日本人设立的，还有中日共同设立的。台湾总督府以及佛教的东本愿寺等宗教组织，也积极介入，另有一些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扩张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辛亥革命以后留学热潮转向欧美，直接向西方学习，同时因为日本的对华侵略和抗日战争的爆发，学习日语的热潮已经不复存在。

(三) 东北地区的中日关系研究。

东北地区的中日关系研究，一直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热点之一，由江夏由树、西村成雄、中见立夫、山本有造共同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的新视角》，由山川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从多角度探讨了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对战前和战后都有着墨，特别是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外交进行了

全面考察,饶有新意。江夏由树从国策和营利的两个角度对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的研究、中见立夫对“满洲国”的“外务省”的研究、黑濑郁二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天图轻便铁道的研究,多有创见,很有启发。

(四) 在日华侨史研究。

安井三吉的《帝国日本和华侨—日本—台湾—朝鲜》,由青木书店出版。作者从日本帝国华侨史的新角度,分析了所谓日本帝国的华侨政策,以及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的华侨社会的情况。由于其范围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故视野广阔,多言前人所未及。日本占领台湾后,有一部分台湾人仍然保留中国国籍,朝鲜被吞并以后,也有华侨依然生活在朝鲜半岛,他们显然受到了日本及其殖民地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和歧视。日本不但分内地人(日本人)和外地人(殖民地人),还把外国人里的一般外国人和中国人区别开来,中国人中的华工地位更等而下之,入境也有严格的限制。内地(日本)、台湾、朝鲜对待外国人的共同特点是,对于进入制造业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拥有土地,这些规定表面上是针对所有外国人的,但因为其中中国人最多,所以实际就是为了限制华侨。根据 1899 年以后的一些规定,对“单纯劳动者”(体力劳动者)的居住和生活区域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在朝鲜的华侨以商人居多,工人和农民占 30%,台湾华侨中则是以工人最多,占 80%。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人入境政策发生突变,主要原因是缺少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人是受强制而来,据统计有 4 万人之多,超过了当时的在日华侨人数。作者认为:“平时限制中国劳动者的入境,一旦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就采取强制手段带来日本,是日本近代对中国劳动者的政策。”

二战结束,台湾回归,华侨问题不复存在,韩国的华侨处境并没有改善。1950 年,韩国政府封锁了华侨的仓库,并强迫使之国

有化,朝鲜战争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华侨财产损失殆尽。1967年更严格限制华侨商店的面积,华侨难以生存,不少不得不流落国外。该书填补了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华侨研究的空白。

(五) 琉球问题的研究。

作为重要朝贡国的琉球,清朝负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但从近代以来,日本加速吞并琉球的步伐,并于1879年彻底把它变为日本的冲绳县。围绕琉球问题,中日之间进行了长期交涉,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出版了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一书,以鸦片战争开始前后到甲午战争前后的琉球的归属为中心,分析了这一时期中琉日关系的各个方面,特别指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鸦片战争以来琉球和欧美列强的关系,认为在欧美列强的外来压力之下,中日琉关系出现了重新整合,而从嘉庆道光朝以来,由于海上风险太大和册封的费用太高,中琉关系已经出现动摇。鸦片战争前后,琉球受到英国舰队的注意,其到来加速了这一动摇。作为中琉来往中心的福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更进一步使琉球对清朝失去了信心。该书资料翔实,分析也有很多独到之处,把琉球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中日琉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与琉球问题相关的还有林泉忠的《“边陲东亚”的认同政治:冲绳、台湾、香港》该书由明石书店出版,作者来自香港,毕业于东京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日本琉球大学。作者提出了“边陲东亚”的新概念,从冲绳、台湾、香港的“归属变更”入手,进行对比研究,很有新意。作者对于处于中国和日本“边境”位置的琉球,以及琉球的“抗日复国运动”,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日本吞并琉球后,一部分琉球人从事复国救援请愿运动,力图挽救琉球王国,一些人怀着绝望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个运动持续到1897年,但这些活动是从琉球国家的独立、自主意

识出发,并不是因为受中国的煽动。作者客观观察的同时,凸现了琉球的自我存在。

除了以上的集中性研究以外,汲古书院出版了黄东兰《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和明治日本》,探讨了清末地方自治和日本的关系,从清末官绅对日本考察、留日学生的作用、两国地方自治的比较等多角度、多层次,厘清了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日本影响的关系。

单篇文章也有一些值得关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日本史讲座第九卷《近代的转换》收录了西村成雄的《国联华盛顿体制下的中国和日本》,该文对国际联盟华盛顿体制下的中日关系演变以及中国对外主权的确立过程,多有创见。

发表在《驹泽史学》第 64 期的赵军的《日中战争期间的大亚洲主义》,以及片冈一忠的《日中条约中的两国官印》都值得关注。前文讨论了过去不太被人注意的留日同学会。该会成立于 1938 年 3 月,是以留日归国后活跃在社会各界的名人作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该文对其成员的言论和活动进行了分析,指出很多成员在日本侵华时期协助了日本占领当局和汪精卫傀儡政权。后文探讨了从《日清修好条规》到《辛丑条约》清朝官印的使用和变化,从满汉合璧到只有汉字,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天朝体系崩溃对外交官印使用的影响,视角独到新颖。

三 英语国家的研究

康拉德·施罗克尔等著的《中日文明简史》^①,旨在使读者对

① Conrad Schirokauer, Miranda Brown, David Lurie, Suzanne Gay,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ivilizations,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5.

中日文明有一个概要的了解,把重点放在中日两种文明的文化方面,探讨各种形式的艺术、日常生活方式、建筑、宗教等的发展演变。本书还涉及这两种文明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中日两国每一个重要朝代的文明都以专章予以介绍。中日两种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自16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与西方的遭遇也在本书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书的几位作者都在大学教书,他们把学术研究与课堂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可读性。

王振平(音)的专著《来自东瀛的使者: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①,利用大量中日文原始文献,对东汉至唐末的中日关系作了考察,详细叙述了汉唐时期日本派往中国的重要使团的历史。这些使团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这些使团,日本学会了中国的统治方法、政府机构、税收制度、佛教教义、儒家思想、艺术和建筑等。作者描述了日本外交使节的生平、个性、文学天赋、抱负,以及他们遭受的挫折。以往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论著总是以“人为中心”,而本书则以外交史为中心,对中国的“朝贡体制”作了令人信服的全新解释。作者认为,日本各藩首领在互相争斗的过程中,积极进行“使节外交”,寻求中国的支持和承认,以加强他们在日本的地位,因而,“朝贡体制”不是向中国统治者屈服的体制,而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一种自愿接受的体制,是那个时期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埃多阿多·法兹奥利的专著《汉字: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

① Wang, Zhenping, *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 of Immortals: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Han-Tang Perio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中文和日文中的 214 个基本字》^①，相当精彩地为西方人介绍了汉字的起源与使用情况，着重探讨了 214 个最基本的字，其中的许多字是中文和日文的基础用字。本书讲的不是如何学习中文，而是一些有趣的字，对于懂一点中文和书法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文中的汉字来源于中文，但与中文隔绝若干世纪后得到独立发展，有了诸多变化，其中的一些简体与现在中文通用的简体有所不同，有其自身的审美原则。

S. C. M. ·潘恩的著作《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观察、力量和地位》^②，考察了长期以来被西方学术界忽视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是描述甲午战争最为详实的一部英语著作。作者认为，日本在战场上迅速击败中国，使得欧洲人不但把日本视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而且视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西方列强乘中国军事失利之机，展开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日本则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英国的盟友。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跃升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也标志着中国的彻底衰落，以及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衰落。作者利用了当时报刊上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日本邮报》和《北华捷报》等报刊，以及西方出版的大量报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约翰·斯坦因伯格等编撰的《全球视野下的日俄战争：第零次世界大战》^③，利用俄罗斯新开放的档案材料和以前鲜为人知的日

① Edoardo Fazzioli,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Pictograph to Ideogram: the History of 214 Essential Chinese/ Japanese Characters*, Abbeville Press, 2005.

② S. C. M. Paine, *The Sino- Japanese War of 1894- 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edition, 2005.

③ John W. Steinberg, Bruce W. Menning, Davi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 David Wolff, Shinji Yokote, *The Russo-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World War Zero*,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文资料,全面考察了日俄战争的军事、外交、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本书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日俄战争,认为日俄战争实际上是第零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冲突,是随后数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灾难的前奏曲。日俄战争的结局进一步表明了沙皇俄国的虚弱,标志着日本以东亚霸主的地位进入了20世纪。

山室信一著、傅佛果译的《日本统治下的满洲》^①,利用大量中日文资料(包括法律文件、政府公报、回忆录、诗歌等),以新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探究了日本对满洲的政策和满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本书对当时在满洲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给予了密切关注,对这一“建国”努力作出了自己的总体评价。作者指出,日本右翼军人和右翼民众认为建设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是建设“人间天堂”的努力,他们以此名义误导许多日本移民,并对满洲的中国人加以虐待。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日本的“独一无二的复兴之路”:关东军内部对于占领满洲和蒙古的各种观点;第二章:把满蒙地区变成“人间天堂”:建设一个新“国家”并追求建国理想;第三章:为世界打造政治样板:创建道德国家的旗帜与“满洲国”政治的形成;第四章:“治国的长期政策将与日本帝国保持一致”:王道乐土与日“满”和并之路;第五章:结论:狂想、现实与幻想。

丹尼尔·巴伦布拉特的专著《人性的瘟疫:日本生物战秘史》^②,是其原作《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的细菌战和秘密而有计

① Yamamuro shin' ichi, Joshua A. Fogel, *Manchuria Under Japanese Domin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② Daniel Barenblatt, *The Hidden History of Japan's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Harper Collins, 2005.

划的种族屠杀》一书的修订版,本书依据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报刊材料和访问记录,揭露了日军七三一部队灭绝人性的种种残暴罪行。作者实地访问了许多中国受害者,对日本细菌战的反人性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本书披露,两万名参与生物武器制作的日本军医和专业技术人员中,战后只有少数人被定罪,最高惩罚只是入狱7年。不少在七三一部队杀人如麻的军医,战后回到日本,当上了受人尊敬的医学院院长,或是腰缠万贯的制药公司总裁。作者指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与日本达成默契,以利用日军已经掌握的生物武器资料,制造自己的细菌武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中国和北朝鲜的士兵,而且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授权下进行的。作者在分析美国刻意隐瞒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原因时指出,其一,美国想尽可能地攫取日本军方的研究成果,以利于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的研究。朝鲜战争时美军就使用生物武器。石井四郎等七三一部队的罪魁祸首战后之所以不被起诉,也是美国讨价还价的结果。

卜正明的新著《合作:战时中国的投日汉奸与地方精英》^①,以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地的合作者为考察对象,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满铁资料、当事人回忆录与中国地方的档案、报纸资料等相互印证,对抗战时期地方精英的对日“合作”进行了全面分析。合作(collaboration)一词在汉语学界通常用更具批判色彩的“投敌”、“卖国”来代替,而其所延伸出来的合作者(collaborator)则与“汉奸”、“卖国贼”相对应。欧洲学术界自1980年代开始对“合作”进行反思,“合作”一词由此被赋予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合作是指不管合作者动机如何,只要是与敌方合作并使

①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敌方的占领持续下去的行为都包括在内;而狭义上的合作则要根据合作者的动机、生存环境等细分。作者在本书中所指的“合作”顺延了狭义“合作”的内涵。在作者看来,合作其实是一个由多种模糊性所促成的行为,这种模糊性包括合作者选择合作的动机及其行为所带来的未能预知的后果,但战后对于合作行为的解读却被限定在特定的框架里,合作行为本身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作者认为,这种不顾实际历史情境,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实际上潜藏着集权的需要,是战后国共两党出于维持自身正统性的需要而共同推行的。

戈登·罗特曼的《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服太平洋(1941—1942)》^①一书考察了太平洋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军队的结构、组织、战术、指挥体系、部署、装备以及建制的发展变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由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遂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抢夺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丰富资源,迫使美国、英国和荷兰保持中立,为日本帝国建立一条外围防线,切断中国的一切外援,从而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虽然日本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因战线扩大,非但不利于解决中国问题,反而加速了日本帝国的崩溃。

凯瑟琳·迪龙和麦克唐纳·戈德斯坦编的《太平洋战争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档案》^②,辑录了日本的一些稀见档案,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学者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这些文件以海军档案和外交档案为主,涉及三个主题:1. 第二次世

① Gordon Rottman, *Japanese Army in World War II: Conquest of the Pacific 1941-42*, Osprey Publishing, 2005.

② Katherine V. Dillon and Donald M. Goldstein (ed.), *The Pacific War Papers: Japanese Documents of World War II*, Potomac Books, 2005.

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海军; 2. 战前外交与政治; 3. 战时日本海军的行动和政策。这些文献还包括一些日本人的日记和战后日本高级将领写的回顾材料等。

(责任编辑: 荣维木)

《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 290 千字。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记述展示了广西抗日战争遗址, 包括指挥地、战场遗址; 日军罪行和中国人民灾难遗址; 抗日英雄及死难烈士纪念碑、塔、墓; 抗战机构活动遗址; 名人故居和文化遗址; 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机构和人员活动遗址; 抗战标语、石刻及抗战报刊、图书、漫画与木刻等。